

新观察



当下散文创作的“痛点”与突围

□杨献平

●仅复述历史和过去,并努力从中找到人类社会的共性特征和基本命运,这样的写作注定很难有太多的当代性,这是历史类散文随笔写作的真正“痛点”所在

●乡村、工业和城市题材的散文写作,如果陷入“案头清供”“走马观花”“现场记录”等浅层次表述,并不能体现当下散文应有的敏锐性和超前性

回顾这些年来的散文发展历程,我以为,一大部分的“功劳”应当归功于诸多小说家们的“探路”,“剑走偏锋”与“他山之石”,“完美”攻玉之功,也有许多诗人、学者和专事散文的作家们,他们的创作同样不容忽视。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新散文运动以来,无论是专门的散文写作者,还是较为专注的散文研究和批评家,都不自觉地把截至目前的当代散文发展成,称为是纯粹的散文写作者的“集体发力”的结果。我认为,在谈论一个文体发展的时候,起点应当放在整个历史长河当中,方才公允和精准。相比其他文体批评体系的成熟与演进,散文批评和研究基本上仍旧处在自说自话的阶段。以此来观察当下的散文创作,其中

有三个方面需要进一步言说。其一,散文写作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涓滴入海,百川成河。回顾白话文运动以来的散文,可谓名家辈出,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家及其散文作品,在今天仍旧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对当代散文创作有着参照和“源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有一大批散文作家接续、拓展了白话散文的“路数”与“宽度”,使得散文的发展和建设呈现出一种持续向前、不断获得有效更新的态势。

小说家张承志、贾平凹、韩少功、铁凝、王安忆、张炜等人对散文写作的崭新理解和文体实践,使得白话散文的写作更有了与时代相匹配的丰满度与新异性,也使得散文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并卓有成效地呼应和见证了“时代”,使得这一古老的文体在新的历史时期,拥有了它应当具备的文体风貌。

及至20世纪80年代,于坚、张炜、周晓枫等人的散文创新,包括王英琦、张立勤、刘亮程等人在散文写作上的“实验”和“开拓”,也构成了中国当代散文发展建设的另一种不可或缺或“生猛力量”。

其二,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诗歌、文学批评、文学翻译,其本质上是“同时共进”的有机整体,如果将其某一个文体单独拿出来检视和言说,小说、诗歌当然没有问题,唯独散文不可以。散文既不像小说那样无所不包、雄浑跌宕,又做不到诗歌那般的纯粹和高蹈,只能在两者之间左右摇摆。努力使散文这一文体不断丰盈、开放和扎实起来,尽可能地与小说、诗歌等文体真正地实现并驾齐驱,是当前散文从业者应当认真思考的一个严峻问题。基于散文自身特点及其在当下的尴尬境地,非虚构的尝试可以看作是散文为逃脱文体限制而进行的一次集体“出圈”和“突围”行动。尽管这些年来有很多的作品被冠以“非虚构”的名目,但到目前为止,本土的真正意义上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似乎还有待作家们进一步开拓。

所谓的非虚构文学作品,我以为应当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要点:一是真切关注和艺术呈现人类历史进程中涉及某种文明和文化深刻变迁的现实题材;二是建立在整个人类基础上,对某些影响到每个人内心、精神和思维,以及现实生活、信仰行为的社会重

大事件进行深入剖析和展现;三是能够以公允的、基于人类历史发展大势,特别是当下生存与精神困境的眼光和胸怀,用智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方式,介入到重大现实问题,进而真正撼动、拷问和探究古老而又永恒的人心人性。也就是说,非虚构文学作品应当既有小说的史诗性,又具备纪实文学的基本要素。在非虚构文学概念被普遍接受的当下,这近似是作家和读者对散文理想状态的一种向往,也是散文家们至今尚未企及的“诉求”。

其三,当下的散文写作整体态势可以用壮大又虚弱、繁荣却衰微来概括。与时代发展和现实变迁的现实相比,散文写作创新能力“滞后”和“僵化”显而易见。在乡村、历史文化、自然地理、生态环境、个人生活、工业题材和内心幽微等题材当中,历史题材无疑是最受宠的,从事这方面写作的专业散文作家比比皆是。但从文体和文学价值上来考量,历史文化类的散文和非虚构作品,如果对现实生活不构成一种隐喻观照,并不会对文学和社会现实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不如乡村、工业、生态、城市等题材的散文写作,对于记录和呈现我们所在的时代具有标本和编年的意义。

历史类的随笔作品对普及相关知识文化有独特的存在价值。尽管历史总是有其重复的“特性”,也有着如古鉴今的作用,但它本质上是过去式的,在很大程度上是“逝者的生活和事迹”,是“他者在昔年的冲突和命运”。时代和社会发展至今,信息化、全球化和各种工具和技术的普及,使得整个人类的

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文学作品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展现作家和诗人所在时代的社会百态、人物流变和存在、发展的细枝末节与典型情境。如果仅仅复述历史和过去,并努力从中找到人类社会的共性特征和基本命运轨迹,这样的写作注定很难有太多的当代性。这大致是历史类散文随笔写作的真正“痛点”所在。

另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是,乡村、工业和城市题材的散文写作,在很多时候也不自觉地陷入了“最后的案头清供”“农耕时代记忆与器物花草赏玩”与“走马观花的城市历史寻迹”和“现场一线的描摹与记录”等浅层次当中,并不能体现散文在当下时代应当具备的敏锐性和超前性。特别是在当代文化背景下,展现个人内心冲突以及人们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呈现出的种种状态,包括精神、思想文化和信仰上嬗变的力度和深度也还不够。

我觉得,散文创作应当具备更大的“雄心”与“境界”,更大范围地去拓展文体的界限,进而增强其表现力。我们应当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增强散文的“好看性”和“广泛度”,在散文创作中有效、精当地引入故事及其相应的叙述技巧,增强感染力与吸引力。抒情性是当下散文写作的重要方式,在关注和真切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性幽微方面,显然还不足如人意。如何密切散文写作与时代的关系?书写“时代的个人经验”和“个人的时代经验”应当成为散文写作的重要方式和方向。

(作者系四川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

「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

□李 萨 何丹璐

《二元之外——戴卫和周庆荣的诗情画意》(以下简称《二元之外》),是四川文艺出版社新近推出的一部独具特色的文艺作品集,具有复合审美效应,给读者带来独特的阅读体验。

所谓复合审美效应,指的是审美主体(读者)对客体(图书)进行阅读时获得的多种审美体验(思悟)叠加的感受。《二元之外》提供给读者的正是这种效应。此书作者是画家戴卫、诗人周庆荣,该书是二人历时十年创作的国画与散文诗作品集。书名取自全书开篇作品——诗人观赏画家《黄山梦之松》时所写的散文诗《二元之外》。何谓“二元”?可以是《黄山梦之松》中对弈双方的输赢关系,也可以是黑白棋子的对峙与缠绵、嬉戏与反目。但浩荡松风提醒诗人从棋局宕开视野,极目“二元之外”的整座山以及“山外更大的辽阔”,那里是“人间的棋子”与“生活的棋盘”。由此观之,散文诗《二元之外》绝非“对画面只做所谓诗意的解读和延伸性诠释”,而是诗人“以散文诗的方式”与画作进行的“平行互动”,是“诗情”与“画意”的所指与能指互映、本义和喻义并存。

从接受美学视角来看,不妨把国画与散文诗视为“二元”,来看看两位作者如何通过各自作品互访互动,从而让读者获得“二元之外”的复合审美体验。一部作品集在手,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画面。画面的具象性和丰富的信息量是其天然优势,也是“读图时代”的概念在当下生成的原因。但同时也必须承认,文字的抽象性可以激活思维,进而生成创造性想象。读者在“阅读—想象”的“二度创造”与思悟生成的“二次升华”过程中带来的审美愉悦不亚于读图效应,可谓“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

披览书中画作,读者会发现书中画作题材丰富,品类多样,有自然写生,有神话传说,有佛道掌故,有文人行状,有诗意图,有族群风俗等,关涉中华人文历史上五千年很多重要的精神呈示。用周庆荣的话说,戴卫是“在画面中创造性地实现古今互访”。这些作品兼工带写,无论小品或巨幅,均以手画心,将中国画的笔、墨、色、点、线、面、书、印、题、跋等要素在传统范式与现代构成之间自由切换。

好的散文诗作品素以思想深邃、视野独到、意象峭拔、语言警策见长。细察全书文章,读者会发现书中所收69篇散文诗作品,与画作呈现的是平行对应而非主次依附的关系;每篇都是在对画作“格物”基础上精雕八极、心游万仞的产物。用戴卫在“后记”里的话说,“这里的‘物’,是生活中的物呈现在戴卫画面上,而后又被诗人二次升华的物,这是周庆荣的心灵世界”。以《诗魂——大地上空的剧场》为例,这是诗人观看画家巨幅国画《诗魂》受到震撼后所作的长篇诗剧。诗人从画家72岁所作《诗魂》的17个人物中精选11人,创作了11幕诗剧,俱各设计了布景、道具与情境,并为每个人物设立了主题词,如“孔丘走向诗”“屈原——一个节日的理由”等,这是中国诗史中每位代表性诗人表征灵魂的关键词,其中浓缩了他们每个人的心路历程与人生行状。饶有意味的是,该诗剧还将画作《诗魂》中部分古印文——实际上是戴卫对画中人定位性解读——以“观众的声音”作为“剧末画外之音”收入,从而将诗人与画家作品的“平行互动”实现了深度的交融。当然,书中的每篇散文诗作品都具有独立的审美品格,诗人在文中表现出的超远视野与入世进取的心态,完全经得起读者沉浸式的审美探测。在捧读《二元之外》时,无论是观画还是读文,既可以平行鉴赏,又可以彼此参照;既可以看到诗人如何观画为文,又可以看到画家如何作画互文。在阅读图文的过程中,复合性的审美效应必定会令读者优游于两种艺术作品中呈现出的丰富世界,进而在诗画互访、古今互动中产生审美愉悦,获得精神上的二次升华。

长期以来,读书界接触到的大多数图书,或是以文为主的插图(配图)方式,或是以图为主的绘本(绣像)、连环画或城外漫画形式;书籍的品相大多是图文主次相宜的关系。读者阅读以文为主的插图(配图)书籍或以图为主的绘本、漫画与连环画时,对其图文互补的形式了然于心,却极少见到图文呈现出“平行互动”关系的书籍。在这个意义上,《二元之外》给读者带来了新的阅读审美体验。

(作者系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教师)

虚构与非虚构的有机融合

□左马右各



《再见,星群》,王苏辛著,译林出版社,2023年2月

《再见,星群》是青年作家王苏辛的最新小说集,集子由8部中短篇小说构成,围绕城市不同职业群体,对当下青年生活景观进行在场展列,在故事略显弱化的衬景中,突显语言的思辨锋芒,多维呈现小说人物的内心洞见与迷顿犹疑,为省察时代纷杂、辨晓人世繁复提供了带有异质感的文本镜鉴。

王苏辛是一个善于在现实方向进行叙事突围的作家。她切入现实愈深,那种寻求突围逸出的欲望便愈发蓬勃。这看似矛盾,却构成作家写作风格的异质性。在写作中,她通过打破作品结构与细节之间的张力对峙,不断尝试在作品自身建立的矛盾性中,完成具有破坏性的文本重建。阅读《再见,星群》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更新读者的阅读认知过程,而小说《远大前程》恰为我们提供了印证作家写作思路的有效蓝本。小说精心搭建的故事框架,不断经受叙事“超界”的骚扰,又每每在可能崩塌的瞬间,退回可疑的“安全”阈值内。刘源、孙尧的求学职场或情感延宕,嵌入浩荡大观的当下社会可谓乏善可陈,但它进入小说文本,却即显砾石为玉的质地。小说在满足人物内心冲突与矛盾的语境中,高密度渗入成长的意识觉醒,既有强力的思辨光芒,又突显个体生命的本真追问,把对当下社会生活的复杂接触,渐次转变成具有普遍意指的“练习怎么解决障碍”,在悟解“责任和亲密感是一种东西”的认知升华过程中,经历心智锤炼和成长实践,找寻属于一代人的自我位置。这既考验作家介入当下生活的判断能力,也在另一个层面上帮助自身从“真实的世界与抽象的书本世界之间的纠缠”中突围。

从作家的第一本小说集《白夜照相馆》,到之后的小说集《在平原》和《象人渡》,王苏辛一直在有难度的写作共情时代。在我看来,写作难度与阅读难度是对等的。前者考验作家是否具有自我“破格”的胆魄和才情,后者考验读者是否具有与作家对话的能力。作家也坦陈她的“作品是有点挑读者的”,我认为,这可以避免作家自身在文学认知上出现可能的降维风险,带有某种“止损”效应,是一种迎难而上的斗争姿态。

《再见,星群》中的小说叙事置身于虚构与非虚构的游离和混搭状态,进行细读时,我被某种原本模糊却愈发增益的感觉攫住,一本由虚构故事完成的小说集竟如此像非虚构。这种感觉在小说《绿洲》《传声筒》《寂静的春天》《柳毅》中尤为明显。无论是《绿洲》中黎姐、《传声筒》中的刘建梅、《寂静的春天》中的肖叶,以及附着在她们身上及周围的人和事,都像游离在小说人物和叙事之外的真实存在。即便是在《猎鹿》《远大前程》的部分叙述中,也不断触发相同的阅读感受。在一场关于小说集《再见,星群》的分享会上,作家赵松就表示这本小说读起来有一种非虚构的感觉。它宕宕开,就连作家自己的朋友也怀疑王苏辛是否真的经历过文本中所叙述的场景。作家的回答更为直接坦率,她说:“我没有直接奔赴过任何一个现场,都是一层一层看过去,看到一层接受一层,等它们重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才想着把这个过程写成一部小说。”这是“通过忠于自身的内部逻辑,虚构得以照会外部世界”的深度自洽和真实反映。站在自身看世界与站在世界反观自我是有区别的,不仅是叙事视角的转换问题,还关涉到文本如何生长与完成生产。作家从事写作是在遍植未知的可能境界,有点像在孤境中打碎灯盏来面对黑暗,唯有作品完结的刹那,才能得到某种精神救赎般的自我和解。

关注当下、关注青年群体一直是王苏辛小说的创作主旨。经由写作,作家经历诸种身处“人群之中”的复杂感触,在体会“一定程度的缓慢,就是周全”的认知嬗变中,犹如小说人物带着迷地“解释自己的位置”,进而完成对外在世界和当下生活的不无“思辨性质的探索”这一目标。人们在社会观念动荡、自主意识沉浮的光影中摇摆,所有既定和潜存的规则秩序,都面临着沦陷与重建的现实泥潭。王苏辛强调“‘此刻’的重要性”,是因为“当下的世界变化太快了”,而“当下的生活是由许多碎片连缀成的日常状态”,她的写作试图对当下生活进行“碎片连缀”式的文学理解与介入,以期达至“艰苦而光明的前路”。

(作者系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

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存在着一批优秀现实主义作品,塑造了一批关于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农民领路人形象”。他们中,有投身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如李准《不能走那条路》中的宋东山,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浩然《艳阳天》中的萧长春、《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等农民形象;有顺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时代潮流的,如贾平凹《浮躁》中的金狗、张炜《古船》中的隋抱朴、李佩甫《城的灯》中的刘汉香、周大新《湖光山色》的楚暖暖、关仁山《麦河》的曹双羊、《金谷银山》中的范少山等农民形象;致力于新时代农村建设的,如赵德发《经山海》的吴小蒿、贺享雍的《海燕于飞》中的乔燕等农民形象。这些人物品形象虽然活动于社会主义建设不同阶段,但是都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实践,是农村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政策的贯彻者、执行者与探索者,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李 超

书写新时代里的新农民新农村

中国当代文学以严肃的现实主义笔调,以想象与记录并举的方式刻画了这批极具人格魅力的“农村领路人”农民形象。他们有众多共同特征:大多数出身于农村,拥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又拥有超出普通农民的视野与人生经验,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有较高的思想觉悟;他们对乡村有深厚情感,对农村抱有强烈认同感,对农村事业有着极大的热忱;既能与农民打成一片,又能看到阻碍乡村发展的积弊,善用新思想、新方法为乡村发展打开新思路;致力于农村发展事业,在乡村治理、乡村经济发展、乡村文化教育等方面贡献突出;自身理想与国家号召高度一致,是所属时代的弄潮儿。

周习的纪实长篇小说《中国农民》中的王为民、王仁义等农村“领头羊”形象与韩大山、梁元、蒋大蒜等知识型农民、科技型新农民形象都当属“农村领路人”序列重要成员。《中国农民》以山东寿光蔬菜产业几十年来发展史为素材,以原寿光县委书记王伯祥等人为人物原型,讲述了菜乡人民在王为民、王仁义等人带领下,通过种植蔬菜、发展绿色产业,最终不仅成功带领菜乡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而且使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走出国门、走向国际的故事。周习在《中国农民》中重点对农村、农民与现代农业科学关系进行观照,梁元及王为民、王仁义、韩大山、梁元、蒋大蒜等“农村领路人农民形象”都因鲜明的知识性、科技性特征成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新农村、新农民形象。

《中国农民》书写了一批致力于农村农业发展的农民知识分子,他们的突出特征在于对科学知识的尊重与“主动”。他们都是菜乡知识先行者,是菜乡腾飞的“领路人”。比如小说中着重突出的农民县委书记王为民因“科学执政”理念,深解民意、深得民心。他们深知农村发展要靠科学技术的道理,王仁义想方设法引进人才韩大山,王为民力排众议留住人才韩大山,他们都对农业人才给予足够尊重。王为民以严谨科学态度运用手中的权力,每一项政策制定实施前都要进行大量实地走访、实地考察,真正做到了科学执政,执政为民。农民韩大山通过自主学习书本知识与反复实践,钻研出了适合辽宁瓦房店自然地理条件的“日光式大棚”技术与黄瓜嫁接技术。韩大山到山东菜乡后,根据当地自然地理条件进一步改进技术,研究出了适合山东菜乡的“冬暖式大棚”技术。根据时代发展需要,菜乡人通过主动与农业研究学者合作,不断更新蔬菜种植科学技术,农民蒋大蒜与研究生张晓卜等人一起成功研究出了有机蔬菜技术。梁元是“身上可以散发着麦香”的农民,可以说他属于“技术型村支书”,他一心研究高产小麦,在村里搞农业科学实验,科学种田。在他的小麦种植技术帮助下,菜乡粮食产量不因搞蔬菜大棚减产,反而增收。菜乡人不但在蔬菜种植方面重视科学,在农业产业管理方面也是如此,蒋大蒜与张晓卜成立绿能合作社,张红薯等人通过蔬菜博览会形式,让全世界人民都了解到了中国农业科技水平与中国农业文化魅力。周习在小说中着重书写了这批有专业农学知识与专业管理技能的“中国农民”形象,这是具有新时代新特征的中国农民形象。

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很多小说涉及到了农村的农业科学知识与技术的书写,如关仁山的《金谷银山》、刘继明的《人境》都书写了粮食优良品种及发展生态农业之于农村发展的重要性;黎晨《村长乡长一个妈》中的白二奎、杨廷玉《花堡》中的村支书孙天鹏等都试图通过学习农业科学知识、研究农作物新品种带领村民发家致富等等,周习的《中国农民》书写了农村与现代农业科学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小说中,农村不再是被动接受现代科学观念的空间,而是变成了主动生产与接纳农业科学知识的场所。韩大山探索暖冬大棚技术、梁元小麦种植技术都来自农民自己的生产实践之中,也经历了主动学习科学知识,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极总结技术经验,而后形成新的农业科学技术的过程。蒋大蒜等人把存在于实验室里的农作物种植技术引入菜乡生产实践当中,使实验室中的科学成果实现了现实价值。

周习在《中国农民》中以深情的笔调塑造了新时代里的新农村与新农民形象,重现了新时代中国农村、农民与现代科学的互动关系,拓宽了书写当下中国新农村审美空间,为中国当代文学书写新乡土提供了宝贵经验。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中国农民》,周习著,山东文艺出版社,2023年5月